

罗贯中研究

# 羅 學

(第五辑)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学刊

胡世厚 郑铁生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6年·郑州

# 编辑委员会

- 名誉主任 韩良会 王琳玉
- 主任 刘世德
- 副主任 关四平 郑铁生 胡世厚 邢蕴武 岳兔立  
范光耀 沈伯俊 杜贵晨 王玉国 王益庸  
李德书
-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 王保玉 王增斌 田同旭 刘永成 张弦生  
孟繁仁 罗二栋 罗朝宇 柏俊才 郭维忠  
高中昌 夏 薇 康守勤 啜希忱
- 主 编 胡世厚 郑铁生
- 常务副主编 范光耀
- 副 主 编 康守勤 啜希忱
- 编辑部主任 刘永成
- 副 主 任 任小军
- 编 辑 陈晓春 刘亚峰

编辑部地址：山西省清徐县罗贯中研究会

邮箱：qxlgzyjh@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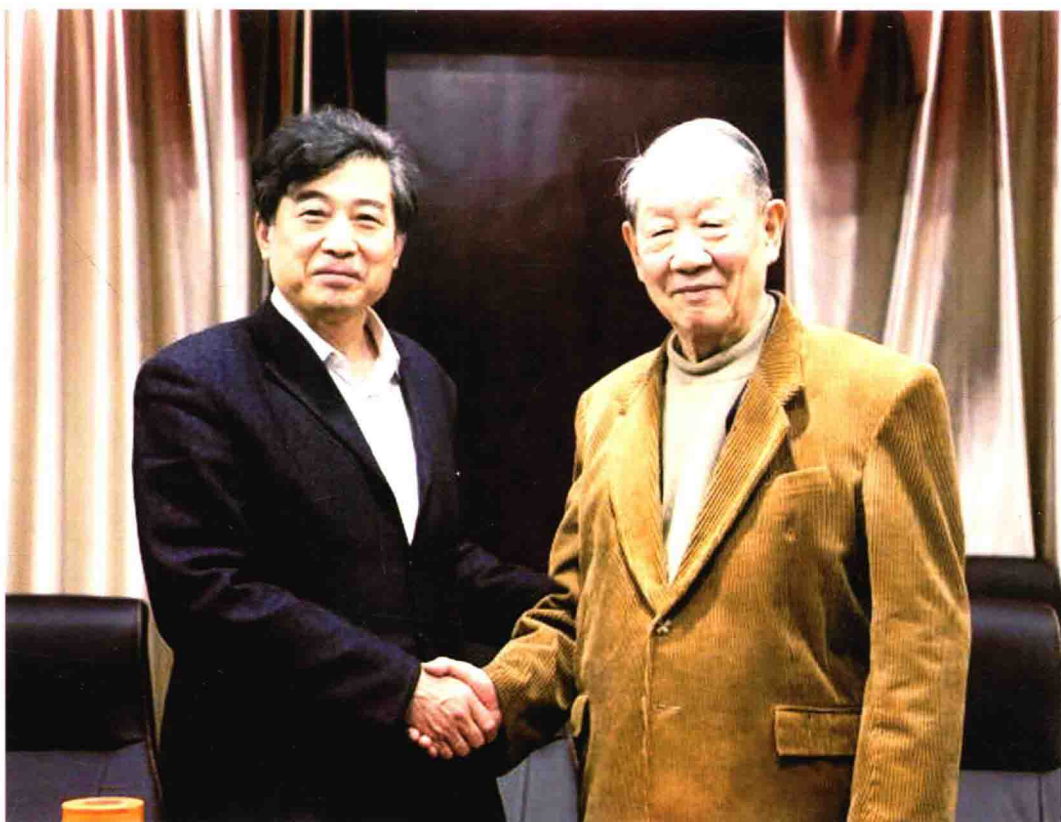
电话：0351-5726094



太原市原市长曹中厚题词



2015年12月6日第二届周瑜文化  
暨第二十三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在舒城召开



舒城会议上中国三国演义学会老会长刘世德(右)向新会长关四平(左)交班

# 卷首语

中国传统风俗逢十遇五，应该隆重庆贺。《罗学》第五辑的问世，标志着以研究罗贯中的生平、思想和著作为中心的学刊创刊五年了。

五年的岁月时间虽不长，但我们走得很淡定，不忘初衷，探讨学术，团结学人。回顾从初创到今天，最感欣慰的是清徐罗贯中研究会同仁的定力——文化自信，源于他们对罗贯中故里的乡愁和眷恋，没有他们积极而主动争取清徐党政领导的支持和给养，没有他们和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团结和合作，没有他们的低调、务实和敬业，就不会走到今天。我们知道这五年《罗学》出版的经费，靠的是清徐县财政的支撑，而这期间正是清徐经济转型时期，财政并不宽裕，但清徐党政领导还是想方设法安排《罗学》的出版经费，一点一滴地建设文化清徐。对此，我们深深地向清徐党政领导、清徐罗贯中研究会致意。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刘世德先生一直支持和关注《罗学》的筹建，甚至稿源和选题，也很关心。我们在纪念《罗学》创刊五周年，不能不首先想到为《罗学》的掘井人。去年冬在周瑜故里召开的“舒城会议”上刘先生从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把重担交给了年富力强的著名学者关四平，担任了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名誉会长。原打算第五期安排刊载对他的访谈，以此形式表达，刘先生作为中国三国演义学会首创会长，连任 28 年所做工作和贡献，以及他本人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成果。我们已经将访谈提纲送给了他，但他很低调，再三表示不愿张扬。因此，本期刊登刘先生为著名学者张锦池大作所作的序言，是临时调换的一文。

学会是做学问的，离开了学问，就走偏斜了。《罗学》创办四年后，在“舒城会议”被正式定为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学刊。这一决定无疑将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办好学刊。一个学术刊物的生命力，根本就是学术品味。我们粗粗地浏览了这五辑的目录，已形成《罗贯中研究》《三国演义研究》《水浒传研究》为重心的学术栏目，发稿多、作者广、档次高，在学术界好评连连。不足之处是关于罗贯中的研

究，除《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外的其他著作，如《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以及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明显稿源不足，待开拓的空间还很大，需要加大组稿的力度。我们常常凭借着在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中活动三十多年的人脉关系，尽力捕捉好的稿件，在浮躁的腐败的学术大环境下打造一块净土。我们虽然无力改变当前抄袭造假、学术乱伦、买卖论文等学术腐败横行的态势，但我们有净化自己的操行的意志，保持自由的精神，坚守独立的思想，摒弃浮躁风气、功利心态，安安静静地做学问，努力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一份成果。

《罗学》出刊后，引起学者十分注目的一个栏目《访谈·回忆》，不断受到点赞。这个栏目专门记述为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研究做出成绩的学者，其中有许多是已逝的学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研究罗贯中和《三国演义》做出的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治学方法、探索精神，以及栽培后学的高风亮节，对我们是一种学术的传承，是一种情感的重温，是一种人性的绽放。对已故的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谭洛非、李悔吾、陈辽，著名学者朱一玄、李厚基、李春祥、赵庆元、刘昆等回忆文字在《罗学》中出现，他们音容笑貌又流荡在字里行间，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欣慰、回忆和力量。我们将把这个专栏继续办下去，竭力办好。

不久前，中州古籍出版社向社会宣告：“向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出版中心进发”，重振上个世纪80年代该社的雄风，打造新时代的出版重镇。《罗学》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不仅在这里出版，而且借势提升自己的学术品味。

# 目 录

## 卷首语

### 【罗学散论】

- 爱民旗号相似 百姓感受有别 ..... 关四平 (1)
- 揭开《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之谜 ..... 孟繁仁 (13)
- 石敬瑭的文化遭遇 ..... 石 麟 (21)
- 从赵云形象的重塑看罗贯中的大义观 ..... 王前程 (32)

### 【三国演义研究】

- 张锦池《三国演义考论》序 ..... 刘世德 (44)
- 三十年来关于《三国演义》虚实叙事的研究 ..... 章 崑 (46)
- 《三国演义》草船借箭故事的形成及影响 ..... 卫绍生 (54)
- 从《三国演义》对《世说新语》材料的艺术处理看“文史沟通”  
..... 齐慧源 (65)
- 《三国演义》中的琴 ..... 过承祁 (73)
- 从“华佗临死传医书”管窥《三国演义》的深层主题  
..... 张 玲 庞伟奇 (78)

### 【东吴文化研究】

- 周瑜形象在《三国演义》叙事结构中的定位及其文化内涵  
..... 郑铁生 (84)
- 从众多旧版《周氏宗谱》看周瑜是哪里人 ..... 李卫生 (98)
- 谈严州文化中的三国东吴文化及其影响 ..... 洪淳生 (109)
- 东吴孙权时期的奇术及其高度繁盛的原因浅析 ..... 朱健文 (121)

### 【三国戏研究】

- 论元杂剧三国戏 ..... 南 枝 (131)

论戏曲舞台上的孙权形象 ..... 陆 进 (142)

### 【文献与考证】

在建阳刻书文化背景上讨论“三国”小说三题 ..... 涂秀虹 (152)

周曰校及其万卷楼刻书活动考述 ..... 许振东 (167)

### 【学者与访谈】

周文业先生和他的《三国演义》版本数字化研究  
..... 马 达 张弦生 (181)

走在自学和研究的路上 ..... 王益庸 (186)

### 【往事与回忆】

悼洛非 ..... 李希凡 (188)

悼念陈辽 ..... 王同书 (191)

怀念刘昆老 ..... 王玉国 (193)

我所知道的晚年邱振声 ..... 郑铁生 (194)

### 【札记与补遗】

抢救整理编印中国第一部《川剧三国戏汇编》 ..... 李德书 (198)

丁岗孙氏祠堂正门楼砖刻四字释 ..... 裴 伟 (201)

闲话野猪林 ..... 王守亮 (203)

三国竞风流 笑谈英雄谱 ..... 任小军 (206)

### 【综述与信息】

第二届周瑜文化暨第二十三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在舒城举行  
..... 李卫生 (212)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第二十三届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纪要 ..... (214)

2015·汉中《三国演义》与三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雷 勇 蒋 丽 (215)

### 【补白】

更正声明 ..... 《罗学》编辑部 (120)





## 爱民旗号相似 百姓感受有别

###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爱民思想比较谈

关四平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主题有多种说法，笔者认为《三国演义》中的“上报国家，下安黎庶”，<sup>①</sup>《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全忠仗义”、“辅国安民”，<sup>②</sup>可视之为两部名著的创作主旨。其中的核心要素是爱民思想。当然这仅是二者的相同点，而其在爱民思想层面的同中之异更值得重视，需要通过比较深入细致地分析之。《三国演义》爱民旗号与作品描写之间是统一的，其矛盾仅体现在作者主观命意与作品客观效果的层面上；而《水浒传》爱民旗号与作品描写之间既有统一性，也有矛盾性，此外，还有作者主观命意本身的自相矛盾在焉。笔者仅拟从两部名著爱民思想层面切入，通过其异同表现的比较谈一些新的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 一、爱民思想与两部名著主旨的趋同性

若从作者的主观命意角度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诸多主题说法中的“忠义说”应当比较符合作品实际，因为两部作品的确是在有意地反复地弘扬“忠义”二字。“忠义”的内涵固然很丰富，笔者在此欲强调的是其中之一，即爱民思想，这应该是忠义丰富内涵的核心要素。这有二书中“下安黎庶”、“辅国安民”证之。二书都很注重士人的人生目标，注重理想人物心目中的社会理想的建构，特别重视是为国为民还是为一己之私这个分水岭，这是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忽视的大原则和首要问题，也是这两部经典名著的主要思想价值之一。《三国演义》之所以歌颂诸葛亮和刘、关、张等蜀汉英雄，关键点在于他们“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人生目标与理想追求。这是刘、关、张桃园结义时的誓词，也是诸葛亮和三人共同追求的人生目标。诸葛亮之所以出山入仕，关键也在此。作者开篇即点出这八字，乃开宗明义，以突出其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这就是作品的主观命意，也可以看作是《三国演义》全书主题之所在。《水浒传》之所以赞美宋江，关键点在于宋江“替天行道”、“辅国安民”这个追求目标。这也可以看作是《水浒传》全书的主题之所在。笔者认为，在众说纷纭的这两部著作的多种主题说法



中,这或许更接近二书作者的原意。如此看来,这两部名著在爱民这一关节点上就体现出异中见同的特点。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作者在创作本旨上,都打出爱民的旗号,前者是“安黎庶”,后者是“安民”。“安黎庶”与“安民”是同义词。可见,这两部名著都把安民、保民作为其创作主旨之一,作为其褒贬人物的主要标准之一。若进一步探讨二者的同中之异,便会发现:二者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建构的流程中,其客观效果却判然有别。《三国演义》是一以贯之,旗帜鲜明,无矛盾之处;而《水浒传》则多有自相矛盾的表现,这既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也表现在某些情节的建构当中。这就使主要人物形象模糊起来,其审美价值自然受到了一定影响,进而影响了全书主旨的表达和价值的判定。孤立看似似乎不明显,而若将二书比较看,问题就显豁起来了。

前贤关于《水浒传》忠义思想的内涵阐释,已经注意到爱民思想的问题。比如余象斗就曾指出:

先儒谓尽心之谓忠,心制事宜之谓义。愚因曰: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为义。若宋江等其诸忠者乎?其诸义者乎?当是时,宋德衰微,乾纲不揽,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英雄豪杰,愤国治之不平,悯民庶之失所,乃崛起山东,乌合云从,据水浒之险以为依,……不知者曰:此民之贼也,国之蠹也。噫!不然也。彼盖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虽未必为仁者博施济众,按其行事之迹,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sup>③</sup>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有三点:一是,余象斗从先儒对忠义的解释入手,进而将其内涵拓展到“为国”与“济民”的层面,这应该说是符合作者本意的。这与《三国演义》的“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语异而意同。二是,针对性强,作者从北宋社会的“国治不平,民庶失所”的背景着眼,论证宋江等人行为的正义合理性,这符合作者对梁山英雄的评价倾向。三是,推究宋江等人行为的主观动机——“原其心”——比较客观,符合宋江等人的心理,而着重以客观上的“其行事之迹”为根据,这就更有说服力。当然,若全面观照全书的整体描写,余象斗的论述还是有片面之处,有绝对化之嫌,即他无视吴用等人的攻打州县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也没有注意作者思想的矛盾之处。因此说,只是强调宋江等人的“济民”一面,是片面的;同样,某些人只是看到宋江等人“害民”的一面,就认定其为“民之贼”,也是片面的。全面客观公正的看法,应该是既要看到他们“济民”的主导面,也不能忽略他们给百姓造成灾难的次要方面,这样主次分明,辩证统一,才符合作者的主观命意与作品的描写实际,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三国演义》的爱民思想，也有其历史渊源：陈寿在《三国志》中就着意突出蜀汉英雄的爱民思想，与此相呼应，也不惜笔墨写出一系列刘备得民心的情况：刘备得徐州是如此：“谦病笃，谓别驾麋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死，竺率州人迎先主”，“百姓与能”。<sup>④</sup>他得荆州也是如此：“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sup>⑤</sup>，“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sup>⑥</sup>他得益州还是如此：“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sup>⑦</sup>，“有志之士，无不竞劝”。<sup>⑧</sup>与此相得益彰的是对诸葛亮爱民之德的凸现。诸葛亮将蜀国治理成“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乐土安邦，使人民安居乐业。在前线屯田时，仍能做到“百姓安堵，军无私焉”，<sup>⑨</sup>这就更难能可贵。陈寿在传后评语中着重赞美他的就是“抚百姓”方面的德行，显然是将其作为爱民贤相的典范歌颂之。这与刘备得人心的叙写相互映衬，凸现出蜀汉集团在得民心方面，是处于三国中最佳境界的。

## 二、爱民旗号与作品描写矛盾论

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二书爱民旗号与作品描写的矛盾层面看，《三国演义》爱民旗号与作品描写之间是统一的，其矛盾只是体现为作者主观命意与作品客观效果的矛盾；而《水浒传》爱民旗号与作品描写之间既有统一性，也有矛盾性，除此之外，还有作者主观命意本身的自相矛盾在焉。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弘扬的爱民旗号与作品描写的统一主要体现在对蜀汉集团爱民行为的理想化表现上。由于理想化的有些过度，反而带来了作者主观命意与作品客观效果的矛盾，令读者产生了是否真实的疑问。刘备的“携民渡江”是如此，诸葛亮的治蜀效果也是如此。试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化社会图景，在当下也是理想而非现实，在当年蜀国连年北伐的情境下，如何能够实现呢？

在《水浒传》中，这种作者主观命意本身的自相矛盾集中表现在第六十六回梁山攻打大名府的相关情节之中。在作者笔下，梁山进攻前北京城里庆祝元宵节的情景是“与民同乐”：“依照东京体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灯五夜。教府尹点视居民勿令缺少；相公亲自行春，务要与民同乐。”灯火的描写细腻而详尽，字里行间洋溢着太平富足的民生安乐景象：

家家门前扎起灯棚，都要赛挂好灯，巧样烟火。户内缚起山棚，摆放五色屏风炮灯，四边都挂名人画片并奇异古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点灯。大名府留守司州桥边搭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红黄纸龙两条，每片鳞甲上点灯一盏，口喷净水。去州桥河内周围上下点灯不计其数。铜佛寺前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青龙一条，周回也有千百盏花灯。翠云楼前也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着一条白龙，四面灯火不计其数。原来这座酒楼，名贯河北，号为第一。上有三滴水雕梁绣柱，极是造



得好。楼上楼下，有百十处阁子。终朝鼓乐喧天，每日笙歌聒耳。城中各处宫观寺院佛殿法堂中，各设灯火，庆贺丰年。三瓦两舍，更不必说。

这些描写形象地昭示出战前大名府里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情景，这可与《梦梁录》等书对当时繁华景象的记载相互印证。<sup>⑩</sup>这无疑在说明着，如果没有梁山强加给北京城里百姓的战争，百姓的生活是和平安宁的。可是梁山军队攻进大名府后，却是到处放火：“此时北京城内，百姓黎民，一个个鼠窜狼奔，一家家神号鬼哭。四下里十数处火光亘天，四方不辨。”连狱吏蔡福都于心不忍，求柴进“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比及柴进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休教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伤损一半。但见：烟迷城市，火燎楼台。千门万户受灾危，三市六街遭患难……可惜千年歌舞地，翻成一片战争场。”这样战前与战后两个场景的鲜明对比，真实地表现出梁山强加于大名府中百姓的战争带给百姓的是深重灾难而不是安乐幸福。

梁山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用吴用的话说就是“救取卢员外、石秀二人性命，擒拿淫妇奸夫，以满兄长报仇之意”。而宋江的态度则更为单一明确：“若得军师真报此仇，宋江虽死瞑目！”可见，宋江发动此次战争的目的，并非是他所宣扬的“辅国安民”，而只是为了救一个卢俊义上山，为了个人的报仇，结果却使广大黎民百姓遭殃受难，这真的值得吗？梁山究竟是给百姓造福，还是让黎民遭难呢？作为此次战役的主帅，吴用自然难辞其咎；那么作为梁山的领袖宋江，是否如刘备那样把百姓的安危放在了首位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从此处描写看，说作者歌颂农民起义的观点，恐怕值得推敲，起码作者对梁山军队的攻城略地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虽然在战后又补了一句“又开仓廩，将粮米俵济满城百姓”，但也无法挽回死去的众多无辜百姓的性命，无法抹去损害百姓的客观事实。特别是与此前北京城里“人民歌舞欣时安”的描写相对比，梁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就更加突出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场战争究竟值不值得发动，作为梁山领袖的宋江是否把百姓的生命置于首位来思考问题？是把百姓视为活生生的具有鲜活生命的人，还是只视为一串数据，当作实现自己私欲的可利用的工具？这是启人深思的大问题，而此前对此问题显然关注不够。

如果说孤证不立，那么再看第三十四回，作者借秦明眼睛的内视点写道：“原来旧有数百人家，却都被火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人妇女，不计其数。”用秦明的话说则是“坏了百姓人家房屋，杀害良民”。这种令人发指的残害无辜百姓的行为，竟然就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指挥手下人干的。那么其目的是什么呢？宋江自己跟秦明解释的理由是“因此杀人放火，先绝了总管归路的念头”。看看，为了让一个秦明死心塌地上梁山，就杀害不计其数的男女百姓，其心地与手段何其毒也！与大名府战役不同的是，宋江这次可是有意在



“杀人放火”，而且所杀死的无辜百姓中竟然有妇女在焉！这与作者所赞美的他的爱民之心不是自相矛盾吗？对此学界虽有各种解释，但无论如何，其“杀害良民”的客观事实是抹杀不了的。从全书看，宋江也没有给百姓带来具体的实惠和好处，在梁山纵横数省期间，反而有不少的害民行为。这与宋江所打出的爱民旗号不是明显矛盾的吗？

此外，这种矛盾现象还体现在作者的概括语句中。如第六十五回回末：“有分教：北京城内，变成火窟枪林；大名府中，翻作尸山血海。”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谁把一座好端端的城市变成为“火窟枪林”的呢？是谁造成了“尸山血海”的惨象的呢？为报仇而不顾百姓死活，这样的梁山领袖还值得百姓拥戴吗？这种行为还应该肯定吗？作者的主观意图又是什么呢？这是耐人寻味的问题，应该如何正确评价也值得深思。

再如第五十七回回末：“有分教：青州百姓，家家瓦裂烟飞；水浒英雄，个个摩拳擦掌。”前后两句就自相矛盾：看前句，是在批判这场战争造成的百姓“家家瓦裂烟飞”的恶果；而再看后句，则又在赞美水浒英雄的“个个摩拳擦掌”去参战。前后联系起来统观，不就成了是梁山英雄造成的百姓罹难的后果吗？作者的意图又要表达什么呢？

相比之下可曰，从所打旗号与实际效果二者的重要性角度说，实际效果要远比打什么旗号重要。就爱民问题而言，历代统治者皆打出爱民的旗号，标榜自己爱民如子，而实际效果如何呢？甚至连《三国演义》中的黄巾军首领张角也懂得“至难得者，民心也”这样的道理，他也是以爱民相号召的，因此迷惑了众多百姓追随之：“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虽然治世与乱世有所不同，但总体上看，在统治者的利益与百姓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统治者基本上是把自已的利益置于首位而置百姓的利益于不顾。有的统治者虽然也知道百姓的重要，如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百姓“能载舟，亦能覆舟”<sup>⑧</sup>的道理，但往往是心里明白迈不动腿。客观效果的最好检验标准就是百姓的实际感受。如果只打出爱民旗号而不顾百姓的感受，那就不是真正的爱民，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拿百姓说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愚弄百姓，就更加可恶！还不如不打爱民的旗号。这是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实质。

### 三、爱民思想见诸集团领袖之异同比较

无论哪个时代，何种集团，作为一个集团的领袖，特别是作为一国之君主，因其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那么他是否爱民，是否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是评价其人格美丑的最主要标准之一。以此衡之，两部名著的作者皆欲借助理想人物寄寓自己的创作意图，凸现出自己的社会理想与人格美理想。两部名著在概念层面、在评价性断语方面皆肯定刘备与宋江是爱民者的形象。但若细加比较，就会发现同中也有异，在具体描写上又有所不同。对文本的分析，既要



宏观着眼，也要微观着手，细微之处见精神，关键环节是不能轻易放过的。有鉴于此，笔者试从以下两个层面比较之：

### 1. 刘备与宋江爱民高峰态描写之比较。

一部作品在表现理想人物的主旋律思想状态时，是应该有高峰态的情节建构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亦如是。

刘备爱民表现的高峰态是“携民渡江”。作者写道：

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云长催船渡之，方才上马。

却说玄德同行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包者不计其数，路过刘表之墓，玄德率众将拜于墓前，哭告曰：“辱弟备无德无才，负兄寄托之重，罪在备一身，与百姓无干。望兄英灵，垂救荆襄之民！”言甚悲切，军民无不下泪。忽哨马报曰：“曹操大军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赶来也。”众将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玄德泣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百姓闻玄德此言，莫不伤感。后人诗赞之曰：“临难仁心存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至今凭吊襄江口，父老犹然忆使君。”

作者在此浓墨重彩、淋漓尽致地渲染了刘备的爱民深情。当然学界亦有人以此作为刘备虚伪的根据之一。“虚伪说”往往以鲁迅先生“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sup>②</sup>的评价为证。其实鲁迅先生主要是谈《三国演义》写人方面的失误之处，具体表现在作者主观命意与客观效果的矛盾上。“欲显刘备之长厚”是作者的主观命意，这个命意并没有错，鲁迅也没有否定这个命意；“似伪”则是作品的客观效果，那是艺术分寸问题。况且鲁迅先生说得很委婉，“似伪”，并非“是伪”。笔者在此则要强调这样几点：

第一，这个情节有史书记载的根据，而非凭空杜撰。《三国志·先主传》曰：

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sup>③</sup>



可见,历史上的刘备就大好于曹操,是历代帝王中的仁君代表者。罗贯中在保持与历史原型总体一致的基础上,熔铸进自己心目中的贤明爱民君王形象特征,再加以艺术创造,一个爱民胜过爱己的千古帝王典型就跃然纸上了。这既体现了罗贯中尊重历史的严谨创作态度,又显示出其天才的艺术创造性,还寄寓了自己及大众的理想愿望,从而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第二,作者多角度地铺叙刘备的爱民诚心,意图在于要树立起一个中国历史上也是中国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理想君王典型,而其“内圣外王”的具体而突出的表现,就是把爱民置于首位,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作者通过百姓“无不下泪”、“无不伤感”的情感表现,凸现出刘备的爱民举动在百姓群体中产生的强烈心理效应。这是百姓拥戴刘备的关键原因所在。

第三,应该将作者的主观命意与作品的客观效果区别开来评价,不能以后者的不如人意来否定前者。一个有良知有追求有理想的作家,在其呕心沥血的大作品中,必然要倾注感情,必须要寄寓理想,而且愈是现实中没有的愈是要以超前的眼光在作品中艺术化地创造出来,以烛照令人失望的现实,给社会一点亮色,给读者以希望。可能有人会说,刘备这样的爱民仁君在社会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封建帝王的本质就是自私的专制的残暴的奴役百姓的。这样的分析固然不错,但是正因为历史上与现实中没有,老百姓才愈加渴望刘备式的好皇帝出现,才在千百年来三国题材的演化过程中,将历代帝王的美质加到刘备身上,将百姓渴望的能够想象出来的素质融会到刘备身上,从而使刘备成为胡适所概括的“箭垛式”的艺术形象。<sup>④</sup>罗贯中也是适应了人民大众对贤君的渴求心理再加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君王形象,这才创造出这样理性化的刘备形象。针对当下崇拜空想而不屑于理想等种种堪忧的价值错位倾向,继承和发扬罗贯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在作品中寄寓美好的社会理想与审美理想,乃是矫正时弊的良方之一。

《水浒传》中宋江爱民的高峰态应该是最后一回宋江任楚州安抚使时的爱民情景描写:

宋公明自从到楚州为安抚,兼管总领兵马。到任之后,惜军爱民,百姓敬之如父母,军校仰之若神明,讼庭肃然,六事俱备,人心既服,军民钦敬。

这里虽然强调了宋江爱民的仁心,但还是概念化的抽象的语言,因为时间短暂,其治理的具体效果远不如诸葛亮治蜀的效果鲜明突出。如果假以时日,或许能大见成效。若云刘备的爱民描写是形象具体的生动鲜活的,那么宋江的爱



民描写则是概念化的干巴巴的，并无感人的艺术力量。其艺术效果，远比不上“刘玄德携民渡江”。

## 2. 刘备与宋江爱民环节之比较。

为了与爱民高峰态相互呼应，以显示理想人物爱民的一贯性，两部名著均在相关情节中多次强化这一点。试举其要者比较之。

先看《三国演义》对刘备爱民行为的强化：第十二回，陶公祖三让徐州而刘备不肯接受，“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可见其得民心的程度。为此，“玄德乃许权领徐州事”，“出榜安民”。

第二十一回，刘备“留下军马保守徐州；一面亲自出城，招谕流散人民复业”。这是其爱民形象的又一次突出表现。这种关爱百姓的举动赢得了百姓的爱戴：“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道而接。”

第三十五回，作者借徐庶之口赞美刘备的爱民成果曰：“吾自颖上来此，闻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可见使君之仁德及人也。”这个情节是罗贯中吸收《三国志平话》的有关描写而设计的。《三国志平话》上卷有这样的描写：曹操“正行之次，见里墩整齐，桥道平正，人烟稠密，牛马繁盛，荒地全无，田禾多有”。此乃刘备治下的德州平原县的百姓安乐图。这在刘备的对立面曹操眼中见出，更增加了可信性与对比效果。从曹操“惊问农夫”的心态看，这是出乎其意料之外的，在当时中国境内是绝无仅有的。罗贯中将地点改为新野县，将正面描写改为他人转述，特别是改为民谣的形式，更能表明这是百姓的心声，传达出作者对百姓明君理想的重视。

第六十五回，刘备打下成都后：“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灯烛，迎门而接。”这是写其得民心。“开仓赈济百姓，军民大悦”，这是写其关心百姓疾苦。“益州既定，玄德欲将成都有名田宅，分赐诸官。赵云谏曰：‘益州人民，屡遭兵火，田宅皆空；今当归还百姓，令安居复业，民心方服；不宜夺之为私赏也。’玄德大喜，从其言。”这是写其为百姓的利益而欣然纳谏。

第八十七回，刘备死后，作者又通过诸葛亮治蜀的百姓安乐政绩，继续强化蜀汉英雄得民心的空前状态。作者写道：

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凡遇差徭门户工役，争先愿行早办。因此军需马匹，器械应用之物，无不完备；米满仓廩，财盈府库。

这段描写中最重要的是“老幼鼓腹讴歌”一句，因为“老幼”乃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生活好了，壮年人自不必说了。“鼓腹”乃物质满足，“讴歌”乃精神愉





悦，二者兼有，说明百姓生活状态已经达到安乐的极致。这显然带有理性化色彩。考其来源，此语亦是来自《三国志平话》中卷的描写：“却说皇叔守荆州，百姓鼓腹讴歌，言皇叔仁德之人。”这充分显示出百姓饱暖安乐的情景，揭示出其感恩戴德的心理。这说明在百姓心目中，理想社会蓝图实现与否的关键，就在于要有刘备这样的爱民圣王和诸葛亮这样的爱民贤相。

与宋江楚州任上爱民描写相呼应的情节，是作者有意强调宋江对百姓的关爱，以显示其与一般强盗的不同。

第四十一回攻打无为军时，宋江嘱咐：“众弟兄去时，不可分毫侵害百姓。”

第五十回攻打祝家庄时，宋江道：“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庄，与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赐粮米一担，以表人心。”

第五十八回，打下青州时，“宋江急急传令：休教残害百姓，且收仓库钱粮。”“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把府库金帛，仓廩米粮，装载五六百车。”

第六十九回打东平府时，宋江“急传将令：不许杀害百姓、放火烧人房屋。”“便开府库，尽数取了金银财帛；大开仓廩，装载粮米上车。”“宋江将太守家私散居民，仍给沿街告示，晓谕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告示已罢，收拾回军。”

第七十回攻打东昌府时，“宋江军马杀入城中，先救了刘唐；次后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饶了不杀。”

统观这一系列强化宋江爱民表现的共性特征，一是，宋江明确发布了号令，不许“侵害”、“残害”、“杀害”百姓。目的是以此表明宋江是仁君，梁山队伍是仁义之师，与其他强盗队伍有本质的不同。二是，杀戮害民州官，饶恕清廉太守，这也是体现百姓的意志，能够立足于百姓的立场上。但是，也应该指出：宋江开仓放粮给百姓，这当然可以给百姓带来实惠，但府库粮仓里的东西梁山自己也要带走，而给百姓也是一次性的，官军回来，百姓可能还会有后灾。

相比之下，梁山与百姓仍然有距离，是居高临下的冷冰冰的保护，百姓只是限于避害而已，仅仅是“所过州县村坊并无侵扰”（第六十八回）；而没有刘备所到之处那样的百姓由衷的欢迎，还未能达到蜀汉那样的军民之间亲切感、亲密度。如：攻打无为军时，“石勇，杜迁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我们是梁山泊好汉数千在此，来杀黄文炳一门良贱，与宋江、戴宗报讎！不干你百姓事！你们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来管闲事！’邻舍有不信的，立住了脚看。只见黑旋风李逵抡起两把板斧，着地卷将来，众邻舍方呐声喊，抬了梯子，水桶，一哄都走了”（第四十一回）。可见，百姓中有的人是看热闹，而大多数是避之唯恐不及。若无刘备的参照，宋江如此这般也算说得过去了，可不比不知道，层次的高低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